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「殖民體制下的民主困境：台灣與香港之比較」專題引言

Introduction to " Democratic Predicaments Under Colonial Regimes:  
Taiwan and Hong Kong"

doi:10.6752/JCS.201403\_(18).0006

文化研究, (18), 2014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18), 2014

作者/Author：李丁讚(Ding-Tzann Lii)

頁數/Page：150-158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14/03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403\\_\(18\).0006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403_(18).0006)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  
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  
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# 「殖民體制下的民主困境：台灣與香港之比較」 專題引言

### Introduction to “Democratic Predicaments Under Colonial Regimes: Taiwan and Hong Kong”

李丁讚

Ding-tzann Lii

近十餘年來，香港展開了如火如荼的民主化運動，也讓人好奇，這些民主化運動與台灣過去三十餘年來的民主化運動有無不同？我們是否可以從一個更大的歷史文化脈絡和政治經濟結構，來審視並比較這兩個社會的民主化運動呢？歷史上來說，台灣與香港都經過「殖民統治」。而且，都在經歷殖民統治後，又經歷了「解殖民」、或「回歸祖國」的過程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兩個社會都在「回歸祖國」之後，卻又經歷了「祖國」的「內部殖民」或是「再殖民」。目前兩個社會都同時面臨中國的「經濟支配」與「統一壓迫」。這些共同的命運，把兩個社會綁得越來越緊。

爲了探索這個問題，「台港頂尖大學交流計畫」<sup>1</sup>特別於去（2013）年12月在清華大學舉行工作坊，主題是「殖民、依賴、與認同：台灣與香港民主化之比較」。本論壇的文章大都是這個工作坊的論文經過修改，再加上吳乃德與洪財隆兩篇特邀稿，共八篇組成。這八

---

1 「台港頂尖大學交流計畫」是台聯大系統亞際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軸計畫之一，結合台港研究型大學，成立聯合研究團隊，以「亞際文化：二十世紀與當代」爲主題，從人文社會跨領域研究角度切入，透過實質合作關係，重探二十世紀到當代之歷史過程與社會變遷。這個計畫除了推動雙方的研究合作外，也要在教學面向上，拓展雙方教師與學生的交流，相互承認學分，並在雙方合作的基礎上，推動國際合作，共同規劃國際研討會，進一步促成國際專書之出版。

篇論文有些直接比較台灣與香港兩地的民主化運動，有些則只專門討論香港或台灣，但透過八篇文章的比較、對照、耙梳、整合，我們希望能對兩個社會的民主化運動，提出一個更整體性的圖像與理解。我們的基本問題是，兩個社會的民主運動會逐漸趨同嗎？還是兩個社會各有不同的民主進程？在這個大的核心問題之下，我們得出了幾個暫時的結論，包括：一、殖民體制下的民主困境；二、經濟依賴下的抵抗模式；三、土地政治下的國族認同；四、選舉政治下的民主妥協。前三個面向似乎正邁向趨同，而第四個面向則讓兩個社會的民主進程趨異，但卻弔詭地把兩個社會綁得更緊。下面依次討論這四個面向：

## 一、殖民體制下的民主困境

香港的民主困境，正如羅永生所說的，乃是一個沒有香港人參與的回歸——被動回歸。這箇回歸其實只是把殖民主由英國換成中國而已，整個治理體系，從行政到立法部門，基本上仍然由殖民宗主來決定，並沒有大幅調整。這也是成名所謂的「半民主體制」。在這種民主體制下，儘管民主派獲六成選民支持，但特區政府普遍不委任民主派進入重要諮詢委員會和區議會，漠視民意，拉遠市民與政府的距離。結果，政府與民間的對立越來越深。

同樣嚴重的是，在政府與民間的對立中，民間的力量也逐漸分立，其中最主要的分立是，「泛民派」與「抗爭派」之間。「泛民派」把重點放在議會選舉，為求爭取與官僚的交換合作，往往採取溫和手法，著重談判協商而非抗爭，更沒有積極經營社運，甚至利用社運累積個人政治資源。羅永生指出，很多激進的民衆認為，「泛民派」人士墨守成規，只關心一個實質上只是個「半民主」，並沒有實質影響力的議會，無法讓民主運動取得實質的進展，甚至被認為是推動民主運動的障礙。這種公民社會內部的緊張與分立，種下日後激進政治組織「社民連」的興起。2009年，「五區公投」運動失敗後，這些緊張與分立甚至演變成整個公民社會內部的大分裂，造成公民社會內部的危機，讓民主運動的推展又多出一層障礙。

從上面簡單的整理可以看出，香港的民主運動所展現出來的「國家與社會」關係，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個層次。第一個層次，香港當成一個整體，乃是在一個新的殖民主（中國）的支配下，構成一個不是真民主的「半民主體制」。第二層次，這個殖民體制的治理結構，必然造成民間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日漸增加，甚至造成二者之間的對立。第三層，民間社會的內部，也因為與政府的關係不同而逐漸分化；對政府相對溫和者，慢慢會失去對政府極端不滿者的信任。而對政府不滿者，則會因為無法改變整個殖民體制，而變得越來越激烈，最後導致民間社會的分裂。

這種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分裂，以及社會內部的再分裂，最根本的原因是，香港當成一個國家，其實不是真正的國家，不但沒有真正的自主權，更不是「主權國家」，而是被後面的殖民主所支配。在這種沒有主權的情境下，「民主」是無法實踐落實的。吳介民對這箇問題有很深刻的分析，他指出：主權國家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前提，任何主權受挑戰的民主國家，民主政治很可能就會陷入不穩定之中<sup>2</sup>。香港案例所顯現出來的各種對立，包括國家與社會之間，以及社會內部之間等，都與這個問題有關，乃是殖民體制所必然出現的民主困境，與台灣所面臨的民主困境有些類似。底下，我們針對這箇問題進行兩個社會的比較。

台灣從1950年代國民黨統治開始，基本上是一個外來政權的統治，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威權體制，對市民社會的滲透也相當完全。唯一的缺口乃是吳乃德所指出的「地方選舉」。一直到1970年代後期第二波民主化，國民黨強大鎮壓無效之後，國民黨才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，開始真正改變統治的形式，不只解除幾十年的戒嚴令，還讓反對黨成立，建立了民主體制的基本雛形。這個趨勢如果繼續的話，台灣的民主化應該會更穩健前進。但不幸的是，自90年代開始，中國日漸強大，構成了所謂的「中國因素」，一日強似一日地對台灣產生莫大的威脅。從此，台灣的民主陷入與香港類似的困境。

---

2 請參考吳介民。2009。〈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〉，《思想》第十一期，頁141-158。

在香港，中國直接指派特首，也間接操弄立法局。這種情形並沒有在台灣發生。基本上，台灣直接選自己的總統，其他各級民意代表或官員也沒有受到中國的明顯操弄。這一點，台灣比香港幸運。但是，在國際上並沒有獲得實際的承認，在兩岸關係上，中國也試圖控制兩岸關係的發展。從這箇角度來看，台灣也算是吳介民所謂的「主權受到挑戰的國家」。因此，出現在香港的三種國家與社會關係，其實也某種程度地體現在台灣的政治過程中，讓台灣也陷入同樣的民主困境中。

第一、如果國民黨執政，討厭中國的民衆（也就是一般所謂的「綠營支持者」）幾乎都會認為，國民黨與中國有一種「共謀」的關係，甚至準備與中國進行統一。因此，國民黨的治理體制雖然不像香港政府的「半民主體制」，但在政策內容上，一般綠營的支持者都相信，國民黨的兩岸政策，都是為未來的統一而鋪路。換句話說，中國扮演一種不在地的殖民主角色，透過兩岸關係的具體政策與內容，對台灣進行實質的滲透與壓迫。<sup>3</sup>第二、正是在這種認知下，國民黨政府就像香港特首政府一樣，很難取得民衆的信任。根據林宗宏的資料顯示，台灣與香港一樣，兩位領導人的民意支持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低，顯示在這種（不在地）殖民支配下，國家的自主性降低，甚至失去主權，社會必然無法信任國家的政策或體制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會處於敵對的狀態。第三、在國家與社會敵對的情況下，社會內部會進行再分化。任何溫和派，或想要與「敵人」（國家）進行協商或合作的人，一定會變成社會的「新敵人」。因此，社會不斷地自我分化，無法建立有效的共識、更不可能團結來解決所面臨的問題。民主只能以不斷地抗爭、不斷地激進化的形式出現。這就是民主的困境，是殖民體制所必然造成的，同時在台灣與香港發生。

以最近爭議中的《服貿》為例，最主要的爭議焦點乃是所謂的「服貿黑箱」，也就是國民黨沒有按照民主應有的程序進行對《服

---

3 如果換成民進黨執政，遠方的殖民主雖然不直接控制台灣的政權，但透過對執政黨在國際進行各種杯葛，往往也會讓執政陷入困境與不穩定之中，進而造成國家與社會的緊張，以及社會內部的對立。

貿》的討論與審議，這對綠營支持者來說是無法容忍、接受的。其實，正如洪財隆指出的，近來區域貿易協定多採自由化幅度較大的「負面表列」方式，兩岸服貿協議則採「正面表列」，自由化程度並不算大。但之所以會引起重大爭議，「主要是馬政府惡質的決策模式（黑箱作業），以及兩岸特殊的情況所致，尤其是彼此的體制差異與社會（政治）不信任。」

## 二、經濟依賴下的反抗模式

除了以上這個很相似的民主困境外，香港與台灣的民主化運動，也因為中國因素的作用，而出現各種趨同的現象。林宗宏就以兩地的政治滿意度和政治認同進行比較發現，兩岸民衆對其政治領袖的滿意度，都比之前的領袖明顯低落很多，這箇原因我們已經在民主困境的第二點討論過。至於政治認同，兩個社會也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，港台兩地都急速減少，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台灣人的，兩個社會都急速增加。這都符合我們對「外部殖民」的想像與預測。畢竟，兩個社會都是在歷經中國的「外部殖民」之前，就經歷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民主體驗。而民主，跟任何其他福利一樣，只要經歷過的就很難收回。中國任何對香港或台灣的壓迫或支配，都必然受到兩地人民的頑強抵抗。甚至在認同表現上，也會越來越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，而本土認同度則會越來越強。

吳介民也指出了兩個社會抗爭形式的「同形化」，包括不同的抗爭形式都有這種趨向：「表現在抗爭對手的指認，例如『中國』、『中資』、『中國因素』；運動修辭框架，例如『本土』、『開放本土』；抗爭戲碼，例如『佔領』等等。」這種同形化現象的起因，吳介民認為是：

中國政府對港台的干預，必須先搭建「經貿依賴關係」，使得兩地的抵抗活動，必須同時在「抵抗資本宰制」與「抵抗外來干預」這兩條軸線上並行。這樣的趨同性，是在強大的中國因素氣旋下，港台兩地的運動者與運動場域間的交換、學習、擬仿與競爭中產生的。

吳介民把台港兩地所受到的壓迫，從「政治殖民」的角度拓展到「經濟宰制」的面向，讓我們對兩個社會的民主化運動有更全面的理解。港台兩地的反抗運動，同時帶有濃厚的「反發展主義」傾向，也累積對資本與權力結盟的不滿，他認為這是兩地反抗運動逐漸趨同的結構因素。

這種趨同的反抗形式、也表現在土地抗爭的面向上。近年來，香港與台灣都發生一系列的土地抗爭行動，陳允中和蔡晏霖對這些土地運動有很精彩的分析。在一個最基本的意義上，香港與台灣的土地運動，都是面對「國家」與「資本」結盟所產生的抗爭行動。香港2003年保育利東街運動，2006年保衛皇后碼頭、天星碼頭運動，2009年菜園村反高鐵運動，2012年東北反滅村運動。台灣從2010年反大埔土地徵收案，以及一系列與科學園區開發相關的徵收案等，都表現出這種「反發展主義」的傾向。

但兩個社會的土地政治也表現出不同的著重點。在香港，土地政治與國族認同逐漸掛勾；而在台灣，土地政治則發展出一種「以農為本」的抵抗資本主義政治。根據蔡晏霖的分析，台灣近年來發展出來的土地運動，從一個更寬廣的架構來看，乃是一種「農藝復興運動」，強調「農」在個人健康、環境生態、社群穩定、文化傳承與創新、以及國家糧食主權上的多元價值。尤其，透過農業的實作與實踐，透過新的生產模式與消費模式的創造，「農」為所有農民與非農民提示了一種可能獨立於資本主義的新生活模式。蔡晏霖說：

我們無法也無須全面回歸一個「以農為業」的農村社會，但卻可以創造一種「以農為本」、「以農作為方法」的不合作運動，藉此癒療並翻轉資本主義發展引致的種種心靈、環境、與文化上的創傷，並為一個與資本主義保持健康距離的生活模式鋪路。

### 三、土地政治下的國族認同

跟台灣不一樣，香港的土地政治與國族政治逐漸產生連結。陳允中指出，2009年的菜園村反高鐵運動，基本上還是一個純粹的「保

護家園運動」，運動的目標是「發展主義的推土機」，也就是「官一商一鄉」的連結體。這與台灣是一致的。但是，經過2011的「反雙非」（反對大陸人來港生子及來港上學）、2012的「反蝗」（反自由的大陸旅客），2013年的「反新移民」的「反蝗三部曲」，再加上「城邦本土派」的論述後，土地正義運動卻從單純的「保護家園」變成「保護香港」的民族主義運動了，這雖然跟台灣當前的土地政治不一樣，但卻與台灣整體的民主運動趨勢更接近。讓我們仔細看看吳乃德對台灣民主化的分析來看看這種趨同現象。

吳乃德對台灣民主運動進行長久的研究後發現，台灣民主化有一些獨具的特色就是，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不只是民主運動，也是族群運動，更是民族運動。吳乃德說：

台灣民主運動最顯著的特性就是：它的目標並非只是改革威權統治、實現自由民主體制，它同時也是一個推翻少數統治的運動，有時候更是一個建立政治社區的運動。也就是說，台灣民主運動不只是政治運動，也是族群運動、和民族運動。

根據吳乃德的分析，台灣的民主運動可以分為三波。第一波民主運動發生在1950年代的「自由中國」，這個民主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台灣的民主體制，也是唯一的純民主運動。第二次民主運動發生在1970年代中葉，反抗的對象不只是獨裁集團，更是外省人集團。而民主的目標則是打破外省人的政治壟斷和文化宰制，因此這波民主化運動除了爭取民主體制外，也是一個「族群運動」。第三波民主化運動發生在1980年代中葉，運動的目標更從「族群」逐漸轉移到「民族」，朝往建立獨立國家而努力。

香港的民主化運動也會朝著獨立建國的方向進行嗎？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，值得繼續觀察。但從歷史來看，香港因為沒有台灣的「族群問題」，「國族」想像的基礎並不那麼清晰明確。再加上現狀的考量，獨立的可能性很低，因此對「國族」的想像遠不及台灣強大，甚至沒有。這是目前兩地民主化運動最大不同之一。但從上面陳允中對土地認同的分析，這些歷史上的因素在近三年中正在經歷巨大的翻轉，香港當成一個「族群」的概念似乎正在逐漸形成中。畢竟，「族群」



是一個建構性的概念，香港的歷史雖然沒有明顯的族群概念與族群範疇，但經歷各種與日俱增的「族群」衝突，族群意識明顯增強很多。

從林宗弘的調查中可以看出，目前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日漸強大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越來越高，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則急速下降。因此，如果中國繼續各種高壓手段，繼續讓大量的大陸移民移往香港，以至於在香港產生不斷擴大的權益衝突，香港人的「族群意識」一定會更加強化，假以時日，其發展成為「國族」的可能性也是有可能的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香港的民主運動正往台灣的發展方向前進。

#### 四、選舉政治與民主轉型

儘管香港與台灣有很多面向都逐漸趨同，但有一個面向，可能是台灣與香港很難趨同的，就是關於「選舉政治與民主轉型」的問題。根據吳乃德的研究，除了族群與民族的成分之外，台灣民主運動另一個主要的特徵是，台灣的威權獨裁政黨在民主轉型之後，沒有立即失去政權，而且一直維持在自由選舉市場中的競爭力，這在所有新興民主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。吳乃德對這箇問題有很精彩的分析，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，國民黨在威權時期仍保持地方選舉，這種地方選舉雖然為民主運動創造了更大的發展空間，但弔詭的是，國民黨也因為地方選舉的舉行，因而建立了廣大的政治盟友，提供了獨裁政府廣泛的社會基礎。吳乃德認為，正是這些社會基礎的存在，使得國民黨有信心做出各種民主妥協，包括讓反對黨成立等。一直到今天，國民黨還是立法院的多數黨，這不能不歸功於早期的地方運作與地方選舉。但這裡我們關心的是，正是這種社會基礎與信心的存在，國民黨才願意、也敢於做出各種民主妥協，民主轉型才有可能發生。

從這箇角度來看香港的民主運動，似乎就不太樂觀了。以過去幾年的投票趨勢來看，民主派大約獲得六成選民的支持，遠遠超過「親中派」。換句話說，中國在香港的社會基礎很薄弱。但是，這個看來讓人興奮的數據，卻也可能是造成中國遲遲不敢開放普選的重要

原因。國民黨之所以願意做出民主改革，正是因為她有信心可以在改革開放後仍保有選舉市場的競爭力。如果沒有這種信心，就可能傾向於繼續支持原來的威權政體。可是，中國在香港並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，她會有信心開放普選嗎？答案相當明顯。如果中國不願開放或不敢開放，而只能繼續用殖民壓迫的方式統治香港，繼續製造大陸人與香港人之間的矛盾，這樣，我們上面所討論的，香港的族群問題與國族問題不是會繼續發酵嗎？香港似乎很難逃脫「殖民」的宿命。這樣，台灣與香港的民主化只會越來越趨近、趨同。而且，兩個社會似乎會綁得越來越緊，越靠越近，也越來越陷入我們最前面討論的「殖民體制」之中，國家與社會充滿對立，社會內部也會陷入緊張、對立、與危機之中，各種激烈的抗爭手段只會增加、不會減少。這就是兩個社會共同的「民主困境」。